

中国同缅甸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下）

陈 炎

八、清朝中缅文化交流的高潮

永历入缅对两国文化的影响：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统治中国。南明的末代皇帝，即桂王朱由榔，号永历帝，在清军的追击下，败走云南。1659年率随从逃入缅甸避难。据记载入缅人数共1,478人。除646人乘船南下外，其余900余人，马940匹，皆陆行至亚哇（即阿瓦）城对河屯驻。后因缅王恐其作乱，把他们分散在各村居住。永历与从臣则由水路至者梗（今实皆），就在陆行者旧驻地，建草房十间定居，备受缅方凌辱和虐待。后来，明朝将领李定国、白文选等曾率大军几次入缅，前来“迎驾”，想把永历救出缅甸，但没有成功。虽在缅王莽白篡位后，强迫永历和随从饮咒水，而死了不少人，但入缅官兵不愿再返中国做清朝的“亡国之民”，而流落在缅甸乡间隐居的为数不少。1661年叛将吴三桂又率清军一万八千人入缅，兵临阿瓦城下，要求缅王交出永历帝。缅王无力抵御，只好引渡永历给吴三桂，以换取清军的撤退。这次清朝大军往返缅甸，其间也有不少官兵流落在缅甸。^{⑥4}所以中国明末清初，改朝换代，在政治、军事上的大动乱，也波及到缅甸，特别是有这么多的中国人留居在缅甸，不能不对缅甸

在各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

首先，随永历一起流亡到缅甸的一部分中国官兵，因遭缅人劫掠避难于沙洲。据《緬考》云：“緬劫永历时，诸人分散居沙洲，蛮不之逐，谓水至尽漂矣，已而水至洲不没，蛮共神之。百余年生聚日盛，称桂家，兵力强，群蛮畏之。”^⑧关于上文中的桂家，孙士毅的《绥緬纪事》中有：“桂家者，明永明王官族子孙，沦于緬，自相署目（疑为“曰”之误），据波龙厂采银。”的记载。上述的波龙厂，《清史稿·属国三緬甸》说：“波龙者，产银。江西、湖广及云南大理、永昌人出边商贩者甚众。且屯聚波龙以开银为生，常不下数万人”。波龙亦名波顿（緬文Bowtwin，意为银矿，今音译为包德温），它始于何年开采，虽确切年代已无从考证，但据H·L·奇伯说：“可以断定，最迟不晚于1412年，中国人就在这里开采了。”^⑨清人赵翼的《粤滇杂记》也说：“彼土人不习烹炼法，故听中国人往采，彼特税收而已。”可见早自明代中叶起，中国人就在緬甸开采银矿，并把开采冶炼的生产技术传入緬甸，促进了緬甸矿业生产的发展。

其次，使波龙厂的生产走向兴旺发达的，就是被称为桂家的领袖宫里雁。《緬考》云：“宫里雁，桂家者，江宁人，故永明入緬所遗种也。”“时亦有敏家，大抵桂家之与也。”可见桂（贵）家、敏家都是随永历入緬者的后裔，还应包括拥明反清的李定国、白文选所率入緬，流落在緬甸的官兵，经百余年生聚繁衍，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其领袖宫里雁被视为“土司”（见魏源《圣武记》），有其创业的波龙银厂“常有工人数万，商贾云集、比屋列肆，俨一大镇。”且“以甲富诸邦称”^⑩，作为他的经济基础。同时，他有一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一旦有事能全体出动，这从记载宫里雁曾率部队击败了茂隆银厂吴尚贤率领的数千人的进攻^⑪，就可证明这一点。宫和吴所领导的两个工厂都各有工人数万，力量雄厚，再加上后来陆续去

缅甸采矿、经商的。他们去缅甸后，欲归不能，正如民谣所说：

“冬时欲归来，高黎贡上雪。秋夏欲归来，无奈窗燠热。春时欲归来，手中贿赂绝。”因而大多流落在缅甸。这样，在缅甸的华工人数越来越多，人多势众，所以说“兵力强，群蛮畏之。”至1740年桂家宫里雁在妈达耶、澳报一带，与孟族流民一起，为反抗缅王的横征暴敛，起而向缅人反击，在白古的敏家配合孟族的起义，也同时起事协助白古建立新政权，并拥立僧人斯弥陶佛陀吉帝（Smim Htaw Buddhaketi, 1740）为白古王。

再次，这些移民还对缅甸佛教产生了影响。为什么留居白古的敏家会同孟族一起，拥立僧人为王呢？这是因为从中国来的移民认为他是作为未来的“真命天子”而降生的，而当地人也认为他是作为“未来佛”（缅人称“Maitreya”即弥勒佛）而降生的。这种大乘佛教的思想是由中国移民传入的。这一信仰起初在云南大理鸡足山盛行。该地被认为是佛祖大弟子大迦叶期待弥勒降生的坐化之地。康熙二十年（1681）云南景东府贡生张保太在鸡足山修行得道创立了大乘教。其弟子张晓使这一教派大为发展，其教义中就有弥勒降生，龙华三会之说。其最流行的时期，正好是云南人往缅甸开矿、经商的移民逐渐增多的时期。因此，在这些移民中，大部分人是被云南最大灵地鸡足山的弥勒降生的信仰而感化了的。弥勒信仰的传入缅甸是与当时缅甸国内发生动乱，正在酝酿革命，寻求王位继承人的形势相吻合。斯弥陶佛陀吉帝被白古人民认为是未来佛降生的弥勒佛（救世主），因而被白古的孟族和中国的移民拥立为王。从而在缅甸也兴起了这一信仰弥勒佛的热潮。今天在蒲甘佛塔寺庙中尚遗存许多弥勒佛像。缅甸考古学家杜生浩认为它们就是从中国传入的^⑧。缅甸自11世纪蒲甘王朝以后，改信上座部（小乘）佛教，而信仰弥勒佛是属大乘教义。日本学者铃木中正和荻原弘明也都认为这显然是由中国移民传入缅甸的^⑨。它的传入不仅给缅甸在佛教文化上增添了

新的信仰，而且还在建立新政权时，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

总之，桂家、敏家和以后陆续去缅甸经商、采矿和务农的中国移民，都是今天旅缅华侨的先民。他们胼手胝足，惨淡经营，对促进当地的矿业、农业和商业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研究缅甸史的西方学者如哈威（G·E·Harvey）和史谷特（J、G、Scott）等人竟把桂（贵）家、敏家都说成似乎与汉族一点也没有关系^①。否定了他们在缅甸历史上的存在和作用。这是别有用心，也是不值得一驳的。只要举桂家宫里雁藏有传家之宝“七宝鞍”（明王室的至宝），总督吴达善曾向他勒索，“宫里雁以其祖宗所传重物，吝不与。”^②就雄辩地证明，桂家确是随南明桂王（永历）入缅时的汉人后裔。因此，汉文化也随他们一起传入缅甸，及其在缅甸的影响，是决非哈威、史谷特等人所能抹煞的。

清缅战争后的两国文化交流：桂家所处的时代，正是缅甸雍籍牙兴起的时代。桂家、敏家在上下缅甸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强，威胁着雍籍牙新政权的建立和对缅甸的统一。因此雍籍牙对聚居在妈达耶和澳报的桂家进行了军事镇压。桂家领袖宫里雁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率部三千人败走云南边境的孟连土司境内，要求中国当局收容。宫里雁的妻子囊占受到孟连土司的勒索和侮辱，在忍无可忍下，杀了土司，逃遁到缅甸。宫里雁虽与此无关，却被云南当局处决。桂家的势力就这样在中缅双方封建统治者的夹击下，被迫溃散了。宫里雁被杀后，当时的缅甸统治者“益无忌，浸寻而及我耿马土司，且以兵来边外，索木邦逸酋。”^③这样缅甸竟向中国境内的孟连、耿马、乃至车里（今西双版纳），索取贡品^④。这是导致发生清缅战争的原因之一。

清缅战争终于在1769年通过和谈结束。两国虽然缔结停战和约，但双方对交换战俘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据《缅甸史》记载：“中国战俘有2,500人仍羁缅京，或事种植、或事工艺，并

娶缅甸妇为妻。”^⑤上面提到的只是在缅甸的中国战俘。乾隆两次派兵征缅甸都以失败告终，主将明瑞首战阵亡，傅恒再征也被击溃，中国官兵溃散流落于缅甸农村的人数，当不在少数。这些人是继桂家之后的新来移民，也是中缅两国工、农业生产技术和文化交流的传播者。下面就是根据现有资料援引的一些例子：

（一）农业方面：中国人在缅甸京郊种植的蔬菜果木有许多新品种如：芹菜、韭菜、油菜、荞头、蚕豆…等蔬菜；又如：荔枝、红枣、枇杷、梅、桃子、柿子…等果木，都是从中国传入的。缅甸人民为纪念中国人民给他们带来的可口的蔬菜和水果，丰富了他们食品的种类和营养，在这些蔬菜和水果的名称前面，都加上缅甸语“德由”（意为“中国”）或直接借用汉语音译，成为新的缅甸文词汇。^⑥

另一方面，据《云南记》记载，在我国云南种植的大腹槟榔、椰子、娑罗树（木棉树）、诃黎勒、老缅甸、缅茄……等等植物则是从缅甸引进我国的新品种。关于缅茄的传入我国，还有以下一段故事：据说万历年间，缅甸使节带来的贡品中有几颗缅茄，神宗就把两颗缅茄赐给茂名（今广东高州县）籍大臣李邦直。李归里后，把钦赐的缅茄视为传家之宝，作为其子佩带的珍玩。后被其子丢失，李却误断被婢女盗窃，而将她处死。婢女含冤而死后，缅茄的幼苗却从其子床下破土而出，经移植、培育，这颗缅茄树已长成高12丈，周围数人合抱的大树了。这件事，虽已三百余年，但当地人民仍在为屈死的婢女鸣不平，并流传着这样一首诗：

缅茄树大已成寻， 婢女含冤悲古今。

硕果至今犹不食， 坚贞真见女儿心。

（见《高州府志》旧茂名《竹枝词》）

这个故事还被编为地方戏剧本，经常在粤西一带演出，深受群众的喜爱和欢迎。想不到缅甸传入的缅茄，竟然会在中国意外

地发芽成长，乃至产生这样大的影响。缅茄果实坚硬，可用来治印，艺人喜在其上雕刻，可作装饰品和珍玩，尚可供药用，主治牙痛去火。《滇海虞衡志》还记载，从缅甸传入的一种椰木，状如槟榔，无枝条，高十余寻，实大如匏，其核可作饮器，粤人喜用它作酒杯能避毒。故在诗文中有：“酒满椰杯消雾毒。”之句。

（二）手工业方面：中国的造船工人，在清缅战争时，被大批征调到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的野牛坝造战船^{⑨⑦}。这些造船工人被俘后留居缅甸仍服务于缅甸的造船工业。现在缅文中“唐舡”、“舡舨”等帆船名词，就是由中国造船工人传入缅甸的。^{⑨⑧}

缅甸曼德勒都城的宫廷建筑，曾由中国工匠参加设计建筑。其宫廷建筑与北京故宫的建筑有很多相似之处，而宫廷花园则被称为“德由午阴”（意为“中国式花园”）^{⑨⑨}。曼德勒皇城的设计和督造者，是一位受缅王聘请的旅缅滇侨，名叫尹蓉。他还在缅京建造一座完全按中国民族建筑形式，仿和顺乡中天寺宫殿兴建的腾越（迤西）会馆（后改称云南会馆），门前有联曰：“苍山东峙，回首多情；黑水南来，同舟共济。”使人有旅居异国，如见故乡之感^⑩。中国古代宫殿的建筑艺术就随之传入缅甸。在缅甸的民间住宅中还可以看到由中国木匠传入的百叶窗，灵活的百叶张可以通风透光，闭可以防雨蔽日，适合缅甸气候，很受当地人民欢迎，称它为“德由格”（意为中国传入的百叶窗^⑪）。古代缅甸农村的主要交通工具牛车以及城市富裕家庭中的西式车辆和人力车，几乎都是仿中国木工的制作型式制造的。缅文中的“人力车”这个名词，就是由中国木工传入的。随之传入的还有木工使用的工具如：手斧、半圆凿、钻、锯等制作，特别是中国的刨（ywe—baw），使用时也仿中国木匠，骑在长凳上推刨^⑫。

中国战俘中有许多是铁匠，原是随军制造兵器的。他们留居缅甸后，就为农村铸造各种生产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具。他们使用

的工具如：铁砧、大铁锤、长把虎钳，特别是鼓风的风箱传入缅甸后，促进了铸造技术的革新。中国铁匠还以制造铁锚而著名^⑬。

中缅两国的金银首饰匠制造的耳环、项练、戒指、发钗和镀金的钮扣，其制造方法和式样都非常相似。中国黄金在缅甸市场上流通以有“足赤”印鑑的为最上品，用作金箔贴在佛塔和佛像上，其制作方法与中国相同，在缅甸用途最广^⑭。

中国丝绸的纺织技术很早就传入缅甸，直到近代缅甸丝织工业区阿摩罗补罗产的最名贵的，被称为“仑德耶”（Lun-taya）的丝绸，其纺织技术就是从中国传入的。^⑮缅甸人民最喜爱广东织制的男筒裙。这在缅甸民歌和文学作品中，也有所反映。例如在缅甸瑞波大鼓曲中就有这样的对唱：“你进城去干什么？”

“我去买广东织制的男筒裙。”这段大鼓曲调，已成为缅甸民间很普及的民歌，曾在缅甸风行一时^⑯。

中缅两国的服饰和缝纫制作也十分相似。缅甸的成衣匠大多是中国移民。男上衣酷似中国旧时的马褂。女子紧身上衣和筒裙则和我国西双版纳妇女的服饰一模一样。缝纫用的剪刀和针都是从中国传入的。在缅甸民间至今仍流传着：“去中国卖针”这句谚语。这句话含有中国针的质量比缅甸的优良，去中国卖针，无异去献丑，犹如中国谚语中的“班门弄斧”。这一谚语源出缅甸著名文学家信摩诃蒂拉温达约在1500年写的《回东墩枝》这首诗中，可见中国针传入缅甸历史之久，影响之深^⑰。

缅甸用甘蔗制的糖，称“江德加”（Kyamtaga 即蔗糖）几乎都由中国人用蒸馏方法提炼的。中国人的甘蔗种植园也生产大量精制蔗糖，其质量可与最好的古巴糖媲美，物美价廉^⑱。

中缅两国的各种工艺美术品的制作，特别是精致美丽的漆器、牙雕、金银首饰、彩色绢伞、绢扇等等，无论在风格上，制作手法上，乃至彩画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是两国工艺美术者

长期以来，彼此交流经验、互相观摩学习的结果。

以上所举只是犖犖大者，中缅两国人民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的交流是多方面的。如上所述涉及到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这里就不一一细举了。

中缅文化交流的兴盛时期：清缅战争后，不久两国恢复邦交关系。至缅王孟云时期（1782~1819），两国的友好往来发展到最高潮。据《清史稿》记载：“乾隆五十二年（1787）孟云遣大头目率从役百余人赍金叶表文，金塔及驯象八、宝石、金箔、檀香、大呢、象牙、漆盒诸物，绒氍、洋布四种”等礼品，要求通好，乾隆也回赠孟云佛象、文绮、珍玩器皿。这是两国战后邦交的开始。两年后（1789），孟云又遣使“贺高宗八旬万寿，乞赐封，又请开关禁以通商旅，帝皆从之，封为缅甸国王，赐敕书印信，及御制诗章，珍珠手串，遣道员、参将赍往其新都蛮得列^⑩，定十年一贡，自是西南无缅患。”^⑪“乾隆六十年（1795），缅王遣使祝厘，进缅石长寿佛、贝叶缅字经、福字镫、金海螺、银海螺、金镶缅刀、金柄麈尾、黄缎缴、贴金象轿、洋枪、马鞍、象牙、犀角、孔雀、木化石、玄猴皮、各色呢、各色花布，都十有八种。”^⑫“嘉庆元年（1796）缅王复遣使朝贡，总督勒保以缅使甫经回国，不宜数来，檄云南司道拒勿纳。事闻，帝谕曰：‘缅甸国王以本年国庆，特遣使臣赍表备物申虔称贺，勒保不据实奏闻，遽行拒绝，致令使臣徒劳跋涉，殊失柔远绥怀之意。勒保交部严议。’令军机大臣拟旨晓谕缅王，颁赐蟒锦四端。五年（1800）缅甸入贡”^⑬。据《缅甸史》记载，中国曾于1787、1790、1795、1796和1822年遣使至缅^⑭。

根据以上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两国使节不但往来频繁而且交换礼品的数量和品种，也都增多。如缅甸的金叶表、金塔、缅石长寿佛、贝叶缅字经、木化石等等。今天已经作为历史文物：有的珍藏在福州的涌

泉寺；有的珍藏在北京西山八大处的灵光寺；有的则陈列在故宫博物院。中国的礼品如乾隆的御制诗章、珍珠手串，特别是封“缅甸国王”金印重十磅，价值9,000罗比，被视为缅甸“国宝”。这些都是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二）两国关系改善后，1789年乾隆满足了缅方提出“开关互市”的要求，规定十年一贡。以后两国的民间贸易，又有新的发展，几千匹骡马组成的商队（马帮）又活跃在中国至八莫的商道上^⑭。

（三）规定十年一贡后，即使缅甸于1824年被英国侵占，也未中断对中国的朝贡。以后，1834、1844和1853年仍遣使来贡。缅甸最后一次来贡是光绪元年（1875）这时缅甸的半壁河山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但仍遣使带着五只大象和一批贵重礼品来贡，受到清德宗和慈禧太后的接见。值得一提的是，1795年缅甸来使中有名叫孟干的。他多次访问中国，还精通汉语，曾把中国的《康熙字典》、《渊鉴类函》、《朱子全书》和李时珍《本草纲目》等大批古籍带回缅甸，为中缅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根据《缅甸史》记载，就在1789~1790年缅甸来使祝寿请封后，中国曾派出千余人的庞大使团，带去册封“缅甸国王”的重三緡斤的纯金大印，还特别提到使团送去三位公主赐给缅王。缅王授予三位公主封号和赐东班城为其采邑。后来三公主生一子授“达都叫封号，赐达耶瓦底城为其采邑”^⑮。这是两国文化交流乃至中缅联姻的历史见证。

中缅文化交流的媒介——和顺乡：随着两国友好关系和贸易往来的发展，地处中缅交通要冲的和顺乡就成为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顺乡人去缅甸开矿、经营珠宝玉石商的很多。他们的后裔在缅甸求学，精通缅、汉语文，任中缅两国高级翻译官（通事）的，也开始见于史书和碑刻。1504年四夷馆译学失传，缅王遣头目思完，通事李瓚入贡，并送孟香、的洒、香牛三人任

缅甸馆序班教员。这位任通事的李瓚就是和顺乡李姓的第五代祖。在李瓚先后还有更出名的通事，是寸玉的一家。据王宗载《四夷馆考》说，朝廷要精通缅甸等语言文字，兼通汉文之人，选送付部，量授官职，腾越有寸文斌、寸玉（文斌子）、寸惜阴（寸玉侄）、寸肤养（寸玉孙）、寸应官（寸惜阴子）、寸登云、寸秉东、贾武、刘国献等，先后授鸿胪寺序班，寸应官授四夷馆教授。寸玉一家祖孙几代就占了五人。其余四人也全是和顺乡人。寸玉等事迹还见于明武宗正德皇帝敕书碑铭。《腾越州志·疆域》说：“和顺乡周围不满十里，离城七八里，居民稠密，通事熟夷语者，皆出其间也。”

明末至清代，边境有治有乱，和顺乡在治乱中，也时有反映。1659年永历入缅先奔腾越，为其作通事的，就是和顺乡人尹襄，并为明室在缅殉难。永历被引渡给清军在昆明遇难后，在腾越的明室官兵几乎全部归农为民，转入商业性的旅缅华侨也不断增多，中缅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1769年中缅在老官屯议和订约时，受缅王指派，与大头目诺尔塔一起，送贝叶文书至老官屯的通事尹士楷，也是和顺乡尹氏第十三代祖^⑩。另有名寸博学者，也出任过通事。在阿桂奏疏中说：“三月十五日绽拉机又差碎冻具禀，同通事寸博学进关……。”^⑪1790年缅王孟云派大头目便己米驼等四人为使臣，带贡品贺礼，赴北京贺高宗八十生辰。这次通事是尹士楷的族侄尹学才。1875年缅甸最后一次遣使来华的通事也是旅缅的华侨李枝荣。

从明末到清光绪年间，如上所述中缅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达最高潮时，和顺乡的文化教育事业，也随之兴旺发达。据尹祖澜撰《和顺两朝科甲题名录序》云：“清淑之气，蔚为人文，其中爵于朝者有人，掇秋魁中副车，贡大廷食廩饫游泮水列成均者有人。”文后列自明至清道光，科甲人名四百余人。李根源先生认为这一时期文风蔚然，形成了“和顺学派”。（引自《和顺乡

居吟》)从道光至晚清,乡中文士辈出,有:尹祖濂、尹祖澜、张成濂、张成清、刘宗鉴、……等20余人,各有专著、自成一家,特别是李生萱——艾思奇,思想、品德、才学都出类拔萃。难怪李根源先生在《和顺乡居吟》中说:“作者居天末,中原旗鼓当,吾力尚可致,丛书集缥缈。”这时还开设中天书馆、魁阁书馆、四于学社、清河学校、和顺小学堂、弘农国学专修馆等等。

以上所举只是和顺乡的例子,中缅边境一带象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可见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促进该乡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影响至深。同样,旅居缅甸的和顺乡人对促进中缅边境一带象八莫等商业城市的发展以及对促进缅甸的矿业、农业、商业……等各方面的发展,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在两国的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

清代缅甸的音乐和乐器在我国的影响:乾隆五十三年(1788)缅王孟云遣使来中国献其国乐。“凡筵燕,和声署(清代官署名)以署史二十有二人,分演粗缅甸乐和细缅甸乐,列于宴乐之末。粗缅甸乐,司歌六人,司乐五人,其乐器有:接内搭兜呼、稽湾斜枯、聂兜姜、聂聂兜姜、结莽聂兜布各一(图见封二)。俱挖发紫红,用缅甸国衣冠。细缅甸乐,司舞二人,俱衣闪缎短衣,束以洋锦、杂色裙,戴紫巾,乐器有:巴打拉、蚌札、总稿机、密穹总、得约总、不垒、接足各一。(图见封二)俱挖发紫红,衣蓝缎短衣,腰带及裙与司舞同。(其制详见《钦定大清会典图》、《清代续文献通考》)

从上图的乐器来看,粗缅甸乐中如接内塔兜呼(长鼓)、稽湾斜枯(八面铜锣)、聂兜姜和聂聂兜姜(锁呐)、结莽聂兜布(铙)等同中国乐器基本上相同。这是两国之间有着长期彼此学习,互相交流的结果。从缅甸乐中,可以看出缅甸民族乐器的特点。如总稿机(缅名Saung-Kauk-gyi意为弯琴)就是唐代骠国献乐中的凤首箜篌的后裔。这种乐器虽然在我国现已绝嗣,仅

能在大同石窟第七洞南壁浮雕、敦煌壁画和新疆石窟壁画中尚可见到，可见两者关系的密切，（见封三上）而在缅甸这个乐器则至今仍在盛行，被称为“音乐之王”。又如密穹总（缅名Mi-gyawn Saung意为鳄鱼琴）就是唐代骠国献乐中的“鼉首箏”。这种乐器也未在我国流传下来，而在缅甸至今仍很普及。（见封三下）

其他细缅甸乐的乐器如：巴打拉（排竹琴、亦称木琴）、不垒（竹笛）、接足（碰钟）、蚌札（鼓）、得约总（弓弦琴）都同中国乐器类似，犹如中缅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那样，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

清代缅甸国乐的乐器、乐律、乐曲和舞蹈的再次传入我国，不能不使我们回忆起汉时掸国和唐时骠国献乐的情况。这次也同前两次一样，不仅丰富了我国的音乐、舞蹈、乐器、乐曲的内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也丰富了我国文学作品的内容，象《新唐书·骠国传》中记载“骠国献乐”一样，《钦定大清会典图》中记载“缅甸献国乐”时，对其乐器的制作、形状、装饰、乃至大小厚薄的尺寸均有详尽的描述，特别是配有图例解说。这是继《新唐书》之后，又一部研究缅甸古代音乐和中缅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著作。

两千年来，中缅两国就是这样，通过友好交往，互通有无的贸易和各种形式的经济文化交流，彼此学习，共同提高，互相影响，不断进步、使我们两国异常灿烂的文化，更加丰富多采，更加发扬光大。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破坏，中缅两国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就比较少了。但是任何帝国主义也破坏不了中缅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为争取各自的独立解放而进行的斗争。我们两国人民不但在反对殖民统治时期，互相有过同情和支持，而且在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的年代里，还并肩作战，用鲜血凝成战斗的友谊，最后取得了各自的独立和解放，从而使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也为

中缅两国的文化交流，谱写出新的篇章！

一九八五年九月

注：

⑥江头城有二说：1、在今缅甸杰沙。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2、旧考以为在今八莫。

⑦木连城名见我国史书。缅名为敏生（Myin-Saing）意为赛马地方。

⑧《信地达巴茂克碑铭》已由缅文译成中文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1辑第72页198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⑨⑩见缅甸《新仰光报》1955年8月10日。

⑪〔缅〕吴巴颖《中缅关系》（缅文）第38页；哈威：前掲书第122页。

⑫该诗原文见《缅甸文学选集》第6页。译文见哈威：《缅甸史》第122页。

⑬见《岛夷志略校释》汪大渊著，苏继庾校释，中华1981年第375页。

⑭见《马哥孛罗游记》商务第241页。

⑮见腾冲县和顺乡《李氏宗谱》。

⑯明朝于1404年在云南布政司下设三个宣抚司和六个宣慰司，史称三宣六慰。三宣者即：干崖、陇川、南甸三宣抚司；六慰者即：木邦、孟养、麓川、老挝、缅甸、八百。见《滇考》卷7。

⑰《太宗永乐实录》卷31。

⑱见《四译馆》“十馆职名缅甸馆”。

⑲吕维祺：《四夷馆增订馆则》见《玄览堂丛书》三集第22册第7卷第22页和23册第13卷第19页。

⑳见《四夷馆·缅甸馆师生姓氏》《玄览堂丛书》三集第24册第7卷。

㉑许云樵《华夷译语传本考》载《南洋学报》1954年第10卷第2辑。

㉒见〔日〕荻原弘明《华夷译语·缅甸馆杂字》载鹿儿岛大学《史录》论说。

㉓江繁：《四译馆考》卷10。

⑮文载缅甸《略瓦底》杂志(缅文)1977年9月第78—80页。

⑯吴埃貌:《诗花环》(缅文)第104页。

⑰哈威:前揭书第199页。

⑱史谷特:《锦绣东方—旅缅生活记录》(V. C. Scott: "The Silken East—A Record of Life and Travel in Burma")第7页。

⑲约翰·克利斯欣:《现代缅甸》(Jhon, L. Christian: "Modern Burma" 第226页。

⑳㉑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第7页。

㉒周一良:《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第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㉓五台山寂度法师提供材料,详见《直纯法师》、《碧山寺简介》。

㉔《滇海虞衡志》卷五。

㉕《腾越州志》卷3第10页。

㉖同上卷11。

㉗《滇系》十二之一附所习缅字及缅汉对照。

㉘参见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第52—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㉙哈威:前揭书第159页。

㉚关于永历入缅详情可参阅:邓凯:《求野录》、《也是录》、《永历纪年》、《行在阳秋》等书。

㉛乾隆《腾越州志》卷10。

㉜H. L. Chibber "The Mineral Resources of Bunma (奇伯:《缅甸的矿产资源》)日译本第16页。

㉝可参阅:魏源《圣武记》、周裕:《从征缅甸日记》等书。

㉞昭槤:《啸亭杂录》卷5,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

㉟杜生诰文,出处同上注㉞。

㊱〔日〕铃木中正:荻原弘明:《贵家宫里雁和缅甸华侨》载鹿儿岛大学《史学》杂志,其译文即将在《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三辑上发表,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⑨ 哈威：前揭书第266页注131。史谷特：《缅甸手册》（J.G.Scott: “Burma a Hand book”）和《缅甸及其外邻》（“Burma and Beyond”）伦敦1932年第280页。

⑩ 昭槿：《嘯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⑪ 魏源：《圣武记》卷6《乾隆征缅甸记》。

⑫ 参见《绥缅纪事》和《征缅纪略》。

⑬ 哈威：前揭书第298页。

⑭ 参考缅甸人民报编《华缅辞典》和陈儒性编《缅汉词典》。

⑮ 《清史稿·属国三缅甸》卷528。

⑯ 费朗：《缅甸》（M.B.Ferrans: “Burma”）。

⑰ 王芝：《海客日谭》第2卷第15页。

⑱ 尹文和：《和顺乡史概述》。

⑲ 缅中友协编：《文化与友谊》第10—12页。

⑳㉑㉒㉓ 费朗：前揭书第112页，第105页，第110页。第100页。

㉔㉕ 同上㉑注第10—12页。

㉖ 梅尔康：《东南亚游记》（Howard Malcom: “Travel in Southeast Asia”）1839，第125页伦敦。

㉗ 蛮得列，即今曼德勒。为敏同王所建，始于1857年，这里指的新都应为阿摩罗补罗。谅为史官所误。

㉘㉙㉚ 《清史稿·属国三缅甸》卷528。

㉛ 哈威：前揭书第314页，与中国史籍的年代略有出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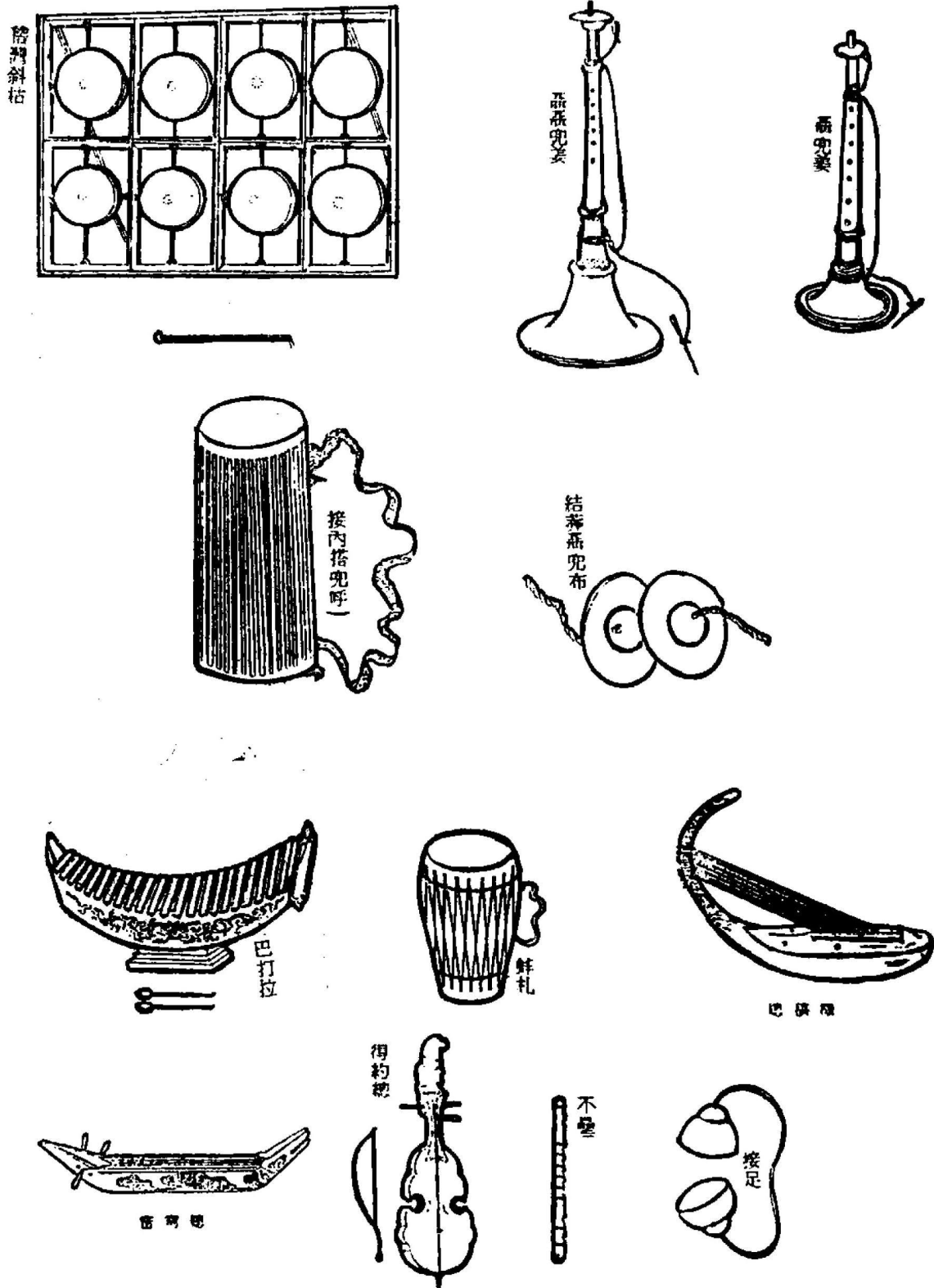
㉜ 安徒生：《经八莫至滇西的考察报告》（J.Anderson: “A Report to an Expeditron into western Yunnan via Bhamo”）加尔各答，1871，第23页。

㉝ 〔缅〕吴巴颖：《中缅关系》（缅文）第58页。

㉞ 尹文和《和顺侨乡史概述》第7页。

㉟ 阿桂、李侍尧：《查讯边务大概情况疏》。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东语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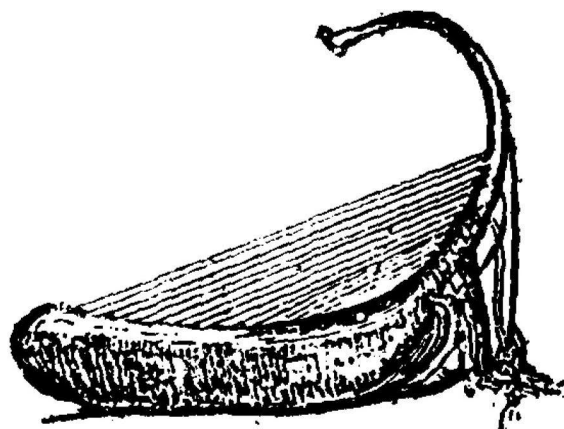


《中国同缅甸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插图

新疆石窟壁画中的龙首箏侯



驃国凤首箏侯的后裔——弯琴



密鸾琴

緬甸的鱷魚琴



《中国同缅甸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插图